

基于 DEA 模型贵州省金融扶贫效率研究

程豪 严浩坤¹

(贵州财经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运用 DEA 模型, 对 2011-2016 年贵州省 49 个国家级贫困县金融扶贫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 贵州省的金融扶贫总体效率在 2011-2016 年一直呈现下滑态势, 2014 年在开始精准扶贫后的总体效率下滑趋势更加明显, 于 2015 年到达低谷, 在经过扶贫转型的摸索阶段后, 2016 年的总体效率下滑趋势有所缓解。其中导致不同治理模式的贫困县金融扶贫效率降低的原因各不相同, 自治县主要由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导致, 非自治县主要与管理水平不足有关。提出提升贵州省扶贫效率的政策建议: 一是加快提升金融机构自身的创新能力, 二是加大对金融扶贫政策的改革力度, 三是积极探索新阶段的扶贫方式。

【关键词】: DEA 模型 金融扶贫效率

【中图分类号】 F327 **【文献标识码】** A

自 2011 年以来, 为了进一步加快贫困地区发展, 促进共同富裕, 党中央颁布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我国的扶贫工作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在对于金融扶贫效率研究方法上, 谈艳玲(2014)采取了 DEA 模型分析方法分析我国秦巴连片特困区的金融支持效率, 中国人民银行衡水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16)、中国人民银行克州中心支行课题组(2018)采取 DEA 模型分析方法分析河北贫困县、南疆四地州集中连片特困县金融扶贫效率, 可以看出采取 DEA 方法可以有效地衡量金融扶贫效率, 对未来扶贫工作的开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 研究样本及指标选取

1.1 研究样本选择

根据张琦, 冯丹萌(2016)的研究, 我国扶贫脱贫标准经历了 1986 年、2001 年和 2011 年的三次重大调整, 其中 1986 年我国第一次制定扶贫标准, 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收入 206 元, 2001 年修改为 865 元, 2011 年将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收入 2300 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不变, 该标准比 2010 年的 1274 元提高了 80%, 按照这一新标准, 我国贫困人口数量和覆盖面由 2010 年的 2688 万人扩大到了 1.28 亿人; 我国的扶贫标准虽然经过很多次调整, 但大体上还是以农民的收入为核心标准, 且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还将贵州省 16 个县划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贵州省贫困县从原来的 50 个增加到了 66 个。故本文选取从 2011-2016 年作为研究期间, 对贵州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贫困县中 49 个国家级贫困县进行研究, 这期间样本贫困人口占全省 70%以上, 一直保持稳定, 且所选贫困县覆盖贵州省主要的贫困特区, 故所选具有代表性。

1.2 投入、产出指标的优选

¹基金项目: 贵州财经大学 2018 年度在校学生科研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程豪(1995—), 男, 安徽黄山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金融投资与风险管理; 严浩坤(1962—), 男, 江西新余人, 教授, 经济学博士, 研究方向: 国际金融、区域经济。

本文选取了两个投入指标和两个产出指标。在投入指标的选取上，根据李伶俐，周灿，王定祥（2018）提出，1986 年以来中国农村扶贫金融方式始终以信贷扶贫占据主导地位，金融机构应该尽量覆盖更多人群、提供更全面的信贷服务，从而有效减少贫困，增加居民收入。考虑到主要是分析金融机构效率对扶贫的影响，投入变量的选取应该以金融机构的相关指标为主，据此选择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和金融机构数量作为最终的投入变量，其中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反映了金融扶贫的深度；金融机构网点数反映了金融银行业扶贫的广度。在产出指标的选取上，刘国义（2009）发现我国贫困县域中小企业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面临严重的资金不足问题，主要原因是资金的体外循环。而衡量金融机构是否发挥出了中介职能，可以通过其吸收当地存款的多寡来判断，故最终选取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收入和个人储蓄存款作为最终产出指标，其中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反映了地区农民的生活水平；个人储蓄存款反映了地区金融机构进行资金配置的能力。

2 贵州省金融扶贫效率实证分析

本部分运用 DEA 模型，实证分析了 2011-2016 年间，贵州省不同治理模式下的金融扶贫效率的改善程度及其影响因素。

2.1 从均值角度分析

从表 1 可以看出，非自治县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大于 1，说明其改革效率均呈现改善；且管理决策正确性改善程度高低的排序依次为非自治县、自治县；技术创新改善程度高低的排序依次为非自治县、自治县；且自治县和非自治县的综合技术效率指数都大于技术进步指数；上述结果的差异可能与非自治县的金融机构各项指标的基数较低，改善空间较大有关。

表 1 不同研究样本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均值及其分解指数比较

不同治理结构	综合技术效率指数	技术进步指数	纯技术效率指数	规模效率指数	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所有县	0.9999	0.9518	0.9838	1.0167	0.9520
自治县	0.9984	0.9365	0.9859	1.0129	0.9350
非自治县	1.0041	0.9943	0.9779	1.0274	0.9989

2.2 从年度指数变化角度分析

从表 2 可以看出，自治县、非自治县的各年度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值总体低于 1，说明两者的金融扶贫效率逐年降低。非自治县的技术进步指数高于自治县，说明前者技术创新程度高于后者，并且实践中民族自治区为了解决金融抑制问题进行金融创新的难度。

表 2 不同产权组织形式样本年度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动态比较

不同治理结构	指数类别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所有县	综合技术效率指数	0.9885	1.0531	0.9162	1.0151	1.0422
	技术进步指数	1.0119	0.9619	1.0369	0.8516	0.9132
	纯技术效率指数	0.9909	1.0006	0.9352	0.9948	1.0120
	规模效率指数	0.9984	1.0567	0.9863	1.0217	1.0327
	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1.0005	1.0116	0.9460	0.8647	0.9516

	综合技术效率指数	0.9740	1.0571	0.9261	1.0111	1.0377
自治县	技术进步指数	1.0058	0.9417	1.0171	0.8344	0.9003
	纯技术效率指数	0.9791	1.0074	0.9368	1.0013	1.0169
	规模效率指数	0.9953	1.0527	0.9931	1.0110	1.0211
	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0.9795	0.9948	0.9377	0.8440	0.9343
	综合技术效率指数	1.0286	1.0421	0.8886	1.0259	1.0547
	技术进步指数	1.0289	1.0177	1.0920	0.8990	0.9490
非自治县	纯技术效率指数	1.0238	0.9817	0.9309	0.9768	0.9985
	规模效率指数	1.0070	1.0679	0.9675	1.0512	1.0650
	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1.0585	1.0582	0.9690	0.9219	0.9995

3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贵州省在 2011-2016 年这一段时期的金融扶贫效率的变化趋势,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从贵州省样本整体的金融扶贫指数来看,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值和技术进步指数均低于 1,说明贵州省贫困县整体金融扶贫效率逐年降低,主要由缺乏技术创新导致;二是从不同治理模式贫困县的角度分析,自治县与非自治县在金融扶贫效率上所面临的问题不一样,自治县的技术创新能力不够,非自治县的管理水平不够;三是从金融扶贫效率指标的年度变化趋势看,2011 年以来贵州省金融扶贫效率有不断降低,到 2016 年这一趋势才有所缓解。

针对以上结论,本文给出的建议是:首先,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需要发挥出自身的地缘优势,针对贫困人口进行信贷产品的创新,如农户个人信贷、信用社联保、“惠农信贷通”等形式来满足不同区域、层次客户的需求;其次,不同治理模式的贫困县应该采取不同的策略来提高金融扶贫的效率,其中自治县应该加强金融机构的管理能力,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非自治县要大力提高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可以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互联网+”模式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最后,针对不同贫困地区发展的难题,一方面要加大政府对金融扶贫的政策改革力度,另一方面政府要强化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加快乡村组组通等项目建设进度,打通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命脉。

参考文献:

- [1]谈艳玲.基于模型的我国秦巴连片特困区的金融支持效率研究[D].西北大学,2014(6)。
- [2]张琦,冯丹萌.我国减贫实践探索及其理论创新:1978-2016年[J].改革,2016(4):27-42.
- [3]中国人民银行克州中心支行课题组.南疆四地州集中连片特困县金融扶贫效率研究[J].金融发展评论,2018(2):27-33.